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陈煦江,刘婷婷

(重庆工商大学 会计学院,重庆400067)

摘要:本文以2014—2017年沪深股市11个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实践能力及其协同作用对公司绩效(财务绩效与市场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对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具有滞后性,但与市场绩效不相关;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与财务绩效存在当期正相关和滞后负相关关系,并与市场绩效负相关;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对财务绩效与市场绩效均具有长期协同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我国上市公司协同推进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社会责任管理能力;社会责任实践能力;协同;公司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1)06—0140—09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企业应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同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激发全社会创造力与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企业,因此企业应肩负起社会责任,乘新时代东风,走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之路,增进公司绩效。陈佳贵等(2009)认为对社会责任而言,管理为责任管理的过程,包含责任治理、责任推进、责任沟通、守法合规等方面,这是每个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原点;根据利益相关方不同,实践通过经济价值创造能力、社会价值创造能力及环境价值创造能力等维度展开。企业应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妥善处理好与新时代契合的关系,探索社会责任内部有效的管理方式,扎实推进社会责任工作,释放企业活力。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及其协同作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理,对于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的影响关系中存在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在调节效应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为了检验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具体作用路径,在两者间引入了长线投资、公司治理、行业竞争、市场发展、政府所有权、法律制度等调节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代表性文献包括:张爱卿和师奕(2018)基于资金供给假说和信号理论,运用情境实验研究方法对406名参与者进行研究发现,长线投资正向调节社会责任绩效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也有学者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公司治理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履行相关社会责任取得的回报越多(Rodriguez-Fernandez, 2016);徐二明和衣凤鹏(2014)基于动态竞争理论,构建了一个刻画企业社会责任、行业竞争与公司绩效三者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提出了行业竞争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滞后期公司绩效,竞争越激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获得公司绩效越高等推论;在转型经济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发展程度越高,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徐二明和衣凤鹏, 2013);靳小翠(2018)通过研究沪市非金融上市公司表明,企业拥有越完善的社会责任相关法律制度,同时加大市场竞争,社会责任对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即市场竞争和法律制度在社会责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收稿日期:2020—04—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生态优先导向下长江经济带企业社会责任复合治理机制研究”(20BGL098);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长江经济带上市公司生态保护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yjskx2020-094-64)

作者简介:陈煦江,博士,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企业社会责任、环境会计;(通讯作者)刘婷婷,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社会责任、环境会计。

在中介效应研究方面,随着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作用关系的持续拓展研究,一些文献在考虑调节变量的基础上,将法律责任、环境责任、声誉、无形资产、研发投入等中介变量纳入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框架中。例如,郝秀清等(2017)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检验了社会责任与长短期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资本对社会责任、长期公司绩效及非公司绩效产生部分正向中介作用,而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陈熙江(2014)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采用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进行研究发现,市场责任在法律责任或环境责任正向影响财务绩效的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而责任管理在市场责任影响公司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Brammer和Pavelin(2006)引入声誉变量研究发现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声誉,从而提升公司绩效;此外,Surroca et al(2010)考察了无形资产对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的中介作用关系;McWilliams和Siegel(2000)发现研发投入对新产品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忽略研发支出在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作用中的中介效应会导致两者之间的直接相关关系不显著。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影响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或中介效应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究,但较少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内部的管理与实践角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展开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的协同作用有所忽视。基于此,本文选取2014—2017年沪深股市11个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及其协同作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权变理论,企业高管的多维度特征具有整合竞争优势资源的能力,有助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从而增加公司绩效(贾建锋等,2015);高尚等(2019)以2014—2016年中药企业为对象,运用面板数据研究了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的影响,表明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有着正向调节作用,即在公司管理能力的调节下,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提升其财务绩效水平;张兆国等(2013)选取沪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滞后一期社会责任对当期公司绩效具有正向影响;马建威和黄春(2019)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越好,内部控制越高,能够通过自身优势实施严密的企业管,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公司绩效。可见,企业通过树立社会责任管理理念,持续推进社会责任的治理与管理,从而实现科学合理的管理实践,增强自身实力,获得更优的公司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当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对公司绩效产生正向影响(H1a);

前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对当期公司绩效产生正向影响(H1b)。

陆孝春(2013)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归因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中小企业管理者对社会责任认知程度越高,企业越容易取得高效的社会实践成果,有利于企业构建社会合法性,提高企业声誉,获得大众认可,最终实现企业经济的增长。企业实行有效的社会实践会为企业带来良好的财务业绩,管理者应该根据企业实情采用不同的竞争战略。戚依南和张晓娣(2008)基于其构建的“管理实践-竞争战略-公司绩效”理论模型并结合问卷调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差异化的供应链管理实践更有助于实现企业价值。因此企业应当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对供应链实践的关注,探索适合的社会实践路径。实际上,企业管理者不得不面对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积极响应其对社会责任的期望,意味着他们将对选择何种实践方式做出艰难选择。O’Riordan和Fairbrass(2008)对制药企业进行调研发现,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核心目标,可为企业社会责任决策提供结构统一、系统全面的方法,同时企业管理人员应该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社会责任实践框架,以有效地回应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骆嘉琪等(2019)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交通运输行业运用动态滞后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当期及滞后一期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公司绩效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当期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对公司绩效产生正向影响(H2a);

前期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对当期公司绩效产生正向影响(H2b)。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管理是企业的一种制度安排,具体包含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方面,而实践主要表现在企业对技术的运用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而言,基于林毅夫等(2006)和许庆瑞等(2006)提出的制度与技术协同效应理论,以及肖红军等(2016)构建的企业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指标体系与陈佳贵等(2009)创建的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理论模型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核心为社会责任理念与战略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水平,以及社会责任推进管理、透明化与合规性运营等正式制度的执行能

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核心是企业对大数据、智能化、云计算等现代技术的运用与创新,两者相互相成、协同共进,通过直接与协同两条路径创造公司价值,包括企业在实践中为客户、股东、员工及社区等利益相关方创造的社会价值、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企业应当避免责任管理与实践长期存在的“两张皮”甚至“相互抵触”问题,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协同关系。

有关企业责任管理与实践的协同作用的实证研究文献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王立和王龙伟(2018)基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视角,基于自然资源基础理论,以227家中国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政府制定的政策对绿色管理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应当紧跟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导向;许慧珍和林丹明(2008)从信息技术的投入与产出分析视角研究表明,企业应当制定社会责任管理实践方案,通过实施科学有效的企业战略,降低实践风险,同时增加对信息技术的投入,能够显著提升公司价值;邓曦东等(2019)通过对汽车行业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高管团队成员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现在企业股权较为集中时,企业高管易于制定社会责任具体实施方案,当且仅当企业实施高水平的管理政策并获得良好的责任实践时,才能够提升公司绩效;李倩等(2019)结合制度基础观、高阶理论与问卷调研,发现制度环境与技术高管占比正向调节企业家精神与公司绩效的作用关系,在新时代的社会环境中,企业家精神帮助企业在危机时刻做出正确研判,即企业家精神正向影响公司绩效;朱泽钢和孔龙(2014)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认为企业通过实施制度设计能够降低利益相关者实施制度约束的成本,从而提高利益相关者参与度,增强企业管理能力,提升企业绩效。基于以上分析,并结合前述假设H1和H2,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当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协同作用对公司绩效产生正向影响(H3a);

前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协同作用对当期公司绩效产生正向影响(H3b)。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文中样本来自沪深股市300上市公司及房地产、食品、制造业、建筑、运输、能源、服务业、公共事业、采矿业、农业、综合11个行业市值排名前50强的上市公司。由于2018年后的企业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指数尚未发布,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跨度为2014—2017年,同时剔除在香港或海外上市的公司及已退市的上市公司,以及上市时间不足2年的上市公司(做滞后一期值回归分析所需)。上述样本涉及的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自肖红军等(2016)撰写的《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报告》中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指数。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公司绩效(CFP),本文采用现有文献广泛运用的公司财务绩效(用总资产报酬率ROA表征)和资本市场绩效(用托宾Q值TOB表征)两个层面对公司绩效进行度量。

2. 解释变量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将上述企业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指数涉及的6个指标维度归并为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和社会责任实践能力两类变量,以便研究两者对公司绩效的单独及协同影响,具体设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CSM)、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CSP)、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的协同作用(CSM×CSP)三个解释变量。其中,管理能力(CSM)与实践能力(CSP)分别根据肖红军等(2016)构建的“企业社会责任成熟度指标钻石模型”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与战略(SRIS)、企业社会责任推进管理(SRM)、合规透明运营能力(CTOA)和经济价值创造能力(ECVC)、社会价值创造能力(SVCA)、环境价值创造能力(ENVC)6个一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加权计算(表1)。从协同学理论来看,协同效应的实质是各子系统相互促进的一种正向调节效应;本文借鉴周雪和马舜羿(2019)的做法,采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与实践能力的交乘项来度量两者对公司绩效产生的协同效应。

3. 控制变量

参考冯丽艳等(2016)和朱乃平等(2014)的做法,在模型中引入公司的产权性质、规模、所属行业、研发支出和风险等控制变量。设置ALR(资产负债率)、INDU(行业)、SIZE(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RD(研发支出占总销售额的比重)、EXCH(上市交易所)和STATE(公司性质)分别控制样本公司的风险、所属行业、规模大

小、研发强度、上市地点和公司产权性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此外，根据崔也光和李博(2018)的研究，研发支出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公司绩效中具有协同作用。因此本文将社会责任成熟度综合得分与研发支出的交乘项用于控制研发支出在社会责任影响公司绩效中的协同效应。上述变量及定义见表1。

表1 研究变量及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度量
被解释变量	总资产报酬率	ROA	净利润TTM/总资产平均余额
	托宾Q	TOB	市值/资产总计
解释变量	社会责任管理能力	CSM	社会责任理念与战略×10%×社会责任推进管理×18%×合规透明运营能力×18%
	社会责任实践能力	CSP	经济价值创造能力×18%×社会价值创造能力×18%×环境价值创造能力×18%
	企业管理与实践能力的协同作用	CSM×CSP	社会责任管理能力×社会责任实践能力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ALR	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
	行业	INDU	房地产、食品、制造、建筑、运输、能源、服务、公共事业、采矿、农业、综合等11个行业，以综合为参照(取0)，其他行业取1
	上市地点	EXCH	沪市取1，深市取0
	企业研发支出与社会责任的协同效应	RD×CSR	研发支出×社会责任成熟度综合得分
	公司性质	STATE	国企取1，其他企业取0

注：解释变量的变量名称及权重度量借鉴了肖红军等(2016)的做法。

(三)模型构建

基于前述假设及对各变量的定义，同时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内生性问题(钱明等, 2016)，本文在模型构建中包含了解释变量CSM、CSP与CSM×CSP的滞后一期值。具体模型如下：

$$CFP_{it} = \alpha_0 + \alpha_1 CSM_{it} + \alpha_2 CSM_{i,t-1} + \alpha_3 CSP_{it} + \alpha_4 CSP_{i,t-1} + \alpha_5 CSM_{it} \times CSP_{it} + \alpha_6 CSM_{i,t-1} \times CSP_{i,t-1} + \alpha_7 RD_{it} \times CSR_{it} + \alpha_8 SIZE_{it} + \alpha_9 ALR_{it} + \alpha_{10} INDU_{it} + \alpha_{11} EXCH_{it} + \alpha_{12} STATE_{it} + \mu_{it} \quad (1)$$

其中：当期公司绩效(CFP_{it})分别用 TOB_{it} 和 ROA_{it} 度量； CSM_{it} 、 CSP_{it} 与 $CSM_{i,t-1}$ 、 $CSP_{i,t-1}$ 分别表示当期与滞后一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与实践能力； $CSM_{it} \times CSP_{it}$ 与 $CSM_{i,t-1} \times CSP_{i,t-1}$ 分别表示当期与滞后一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的协同作用； $RD_{it} \times CSR_{it}$ 表示当期研发支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作用； $SIZE_{it}$ 、 ALR_{it} 、 $INDU_{it}$ 、 $EXCH_{it}$ 和 $STATE_{it}$ 分别表示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所属行业、上市地点和公司性质； α_i 表示待估参数； μ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五、实证研究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STATA15.0对所选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囿于篇幅，表2仅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从公司绩效来看，托宾Q(TOB)的最大值为45.683，最小值为0.094，这意味着不同企业的市场绩效水平良莠不齐；而总资产报酬率(ROA)的最小值为-2.477，最大值为0.396，也表明企业之间的财务绩效存在明显差异。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CSM)与实践能力(CSP)的均值与标准差均较低，表明样本公司在企业管理与实践方面仍处于较低水平。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的交乘项($CSM \times CSP$)、研发支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乘项($RD \times CSR$)的均值显示不同企业在社会责任的内部管理与实践的协同，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二)相关性分析

为初步检验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以及各解释变量与控制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TOB	0.094	45.683	2.449	2.340
ROA	-2.477	0.396	0.024	0.064
CSM	0.000	1.894	0.056	0.149
CSP	0.000	2.988	0.392	0.473
CSM×CSP	0.000	3.900	0.058	0.232
RD×CSR	0.000	3.600	0.006	0.047
SIZE	18.691	26.693	22.274	1.100
ALR	0.000	3.613	0.352	0.214
SRIS	0.000	1.015	0.335	0.198
SRM	0.000	0.853	0.057	0.115
CTOA	0.000	1.080	0.458	0.151
ECVC	0.000	0.985	0.683	0.106
ENVC	0.000	0.956	0.211	0.183
SVCA	0.000	0.905	0.357	0.156

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其中,当期与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实践能力及两者的协同作用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市场绩效负相关;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实践能力及两者的协同作用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财务绩效负相关。根据相关系数矩阵,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较小,多数低于0.550;解释变量的方差扩大因子(VIF)的最小值为2.390,最大值为4.310,远低于多重共线性的临界值10。因此,变量间多重共线性在可接受范围内,可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

表3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TOB_{it}/ROA_{it}	CSM_{it}	$CSM_{i,t-1}$	CSP_{it}	$CSP_{i,t-1}$	$CSM_{it} \times CSP_{it}$	$CSM_{i,t-1} \times CSP_{i,t-1}$	$RD_{it} \times CSR_{it}$	$SIZE_{it}$	ALR_{it}
TOB_{it}/ROA_{it}	1	0.000	-0.055***	0.047***	-0.048***	0.000	-0.061***	0.012	0.049***	-0.248***
CSM_{it}	-0.136***	1	0.709***	0.509***	0.428***	0.899***	0.671***	-0.005	0.327***	0.104***
$CSM_{i,t-1}$	-0.140***	0.709***	1	0.400***	0.490***	0.684***	0.901***	-0.007	0.311***	0.112***
CSP_{it}	-0.180***	0.509***	0.400***	1	0.635***	0.563***	0.415***	-0.001	0.387***	0.096***
$CSP_{i,t-1}$	-0.188***	0.428***	0.490***	0.635***	1	0.459***	0.550***	-0.007	0.358***	0.100***
$CSM_{it} \times CSP_{it}$	-0.129***	0.899***	0.684***	0.563***	0.459***	1	0.736***	-0.003	0.331***	0.092***
$CSM_{i,t-1} \times CSP_{i,t-1}$	-0.140***	0.671***	0.901***	0.415***	0.550***	0.736***	1	-0.005	0.329***	0.104***
$RD_{it} \times CSR_{it}$	-0.011	-0.005	-0.007	-0.001	-0.007	-0.003	-0.005	1	-0.006	-0.020
$SIZE_{it}$	-0.540***	0.327***	0.311***	0.387***	0.358***	0.331***	0.329***	-0.006	1	0.367***
ALR_{it}	-0.328***	0.104***	0.112***	0.096***	0.100***	0.092***	0.104***	-0.020	0.367***	1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左下方和右上方分别为TOB、ROA的相关性分析。

(三)回归分析

为检验H1~H3,本文基于前述构建的回归模型,进一步对样本公司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分析、随机效应回归分析与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由于本文选取的样本期间为2014—2017年,受回归自由度等因素的限制,仅适合做滞后一期的检验。本文根据白仲林(2008)的建议,首先对混合回归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进行F检验,F检验值分别为14.440与1.770,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显著优于混合回归模型;其次,进一步通过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对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进行选优,检验结果的 χ^2 统计量分别为118.270、85.410,故拒绝为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接受固定效应模型为最优模型。为了避免不同检验方法对最优模型产生的偏误,表4完整地列示了固定效应模型、混合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表4 三种面板数据分析模型的回归结果比较

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1)		混合回归模型(2)		随机效应模型(3)	
	被解释变量 ROA_{it}	被解释变量 TOB_{it}	被解释变量 ROA_{it}	被解释变量 TOB_{it}	被解释变量 ROA_{it}	被解释变量 TOB_{it}
C	0.843*** (0.007)	43.716*** (0.000)	-0.132*** (0.000)	19.760*** (0.000)	-0.137*** (0.000)	21.208*** (0.000)
CSM_{it}	-0.041*** (0.008)	-0.123 (0.399)	-0.007 (0.571)	0.026 (0.930)	-0.012 (0.342)	-0.010 (0.965)
$CSM_{i,t-1}$	-0.055*** (0.005)	-0.335 (0.407)	-0.004 (0.575)	0.101 (0.815)	-0.010 (0.441)	-0.240 (0.359)
CSP_{it}	0.008** (0.016)	-0.103*** (0.004)	0.016*** (0.000)	0.005 (0.935)	0.016*** (0.000)	-0.074* (0.052)
$CSP_{i,t-1}$	-0.026*** (0.000)	-0.183*** (0.004)	-0.013*** (0.000)	-0.067 (0.334)	-0.015*** (0.000)	-0.193*** (0.000)
$CSM_{it} \times CSP_{it}$	0.031*** (0.001)	0.201** (0.033)	0.002 (0.813)	0.189 (0.241)	0.008 (0.309)	0.191 (0.203)
$CSM_{i,t-1} \times CSP_{i,t-1}$	0.023** (0.027)	0.409** (0.015)	0.000 (0.984)	0.252 (0.247)	0.002 (0.845)	0.412*** (0.009)
$RD_{it} \times CSR_{it}$	0.028*** (0.000)	-0.084*** (0.000)	0.016*** (0.000)	-0.789*** (0.000)	0.021 (0.066)	-0.186 (0.350)
$SIZE_{it}$	-0.036*** (0.009)	-1.749*** (0.000)	0.007*** (0.000)	-0.767*** (0.000)	0.007*** (0.000)	-0.828*** (0.000)
ALR_{it}	-0.018 (0.358)	-0.572 (0.306)	-0.044*** (0.000)	-1.473*** (0.000)	-0.040*** (0.000)	-1.345*** (0.000)
$INDU_{it}$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EXCH_{it}$	0.012 (0.203)	-0.206 (0.307)	0.002 (0.413)	-0.105 (0.205)	0.003 (0.410)	-0.106 (0.205)
$STATE_{it}$	-0.103*** (0.000)	-0.450*** (0.000)	-0.003 (0.220)	-0.350*** (0.000)	-0.003 (0.221)	-0.360*** (0.000)
Adj. R^2	0.108	0.303	0.089	0.334	0.081	0.336
F	293.61***	19.580***	37.040***	77.380***	/	/

注:括号内为P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4中的最优模型固定效应模型(1)可见：

(1)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方面。首先,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CSM_{it})及其滞后一期值(CSM_{it-1})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财务绩效(ROA_{it})负相关,该结论拒绝了假设H1a和H1b,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制度的设计、制定、执行到转化为财务绩效需要耗费较高的财务成本,牺牲部分财务绩效,并且存在一定周期的滞后性(样本公司为至少滞后一个财务年度)。其次,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CSP_{it})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财务绩效(ROA_{it})正相关,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在当期即可对财务绩效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在转化为财务绩效的过程中表现出近似“零时滞”的当期效应,支持了假设H2a;但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的滞后一期值(CSP_{it-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财务绩效(ROA_{it})负相关,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同样会耗费一定的财务成本,牺牲部分财务绩效,其发挥对财务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的有效周期最长为一个财务年度。最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交乘项的当期值($CSM_{it} \times CSP_{it}$)与滞后一期值($CSM_{it-1} \times CSP_{it-1}$)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财务绩效(ROA_{it})正相关,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存在短期与长期的协同效应,并且短期协同效应强于长期协同效应,支持了H3a和H3b。此外,在控制变量中,当期研发支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乘项($RD_{it} \times CSR_{it}$)与当期财务绩效(ROA_{it})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表明两者在提高财务绩效方面存在短期协同效应。

(2)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对市场绩效的影响方面。首先,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CSM_{it})及其滞后一期值(CSM_{it-1})与当期市场绩效(TOB_{it})均无显著相关性,拒绝了假设H1a和H1b,表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信息处于“弱反应”状态,其原因可能是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强制性与自愿性信息披露较少;其次,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的当期值(CSP_{it})与滞后一期值(CSP_{it-1})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市场绩效(TOB_{it})负相关,拒绝了假设H2a和H2b,表明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对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实践的行为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存在较为悲观的预期,这可能是由于当前大多数投资者对企业发展的认识还停滞于片面的经济增长,亟待转型升级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高质量发展理念。最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交乘项的当期值($CSM_{it} \times CSP_{it}$)与滞后一期值($CSM_{it-1} \times CSP_{it-1}$)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市场绩效正相关,表明我国资本市场对协同实施科学的制度建设与技术运用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新模式充满期待。此外,在控制变量中,当期研发支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乘项($RD_{it} \times CSR_{it}$)与当期市场绩效(TOB_{it})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表明两者在提高市场绩效方面不存在短期协同效应,是否存在长期协同效应则需进一步检验。

(四)内生性检验

自Moskowitz(1972)以来,理论和实证文献就开始关注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的关联关系。于洪彦等(2015)基于制度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发现,当企业资本处于适中水平时,社会责任活动才能发挥对企业绩效的最优影响。李双辰等(2015)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电力企业当期财务绩效水平与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而尹开国等(2014)基于机构投资者短视理论发现,企业财务绩效水平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因此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可能互为因果关系,即存在内生性问题。

为了检验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根据伍德里奇(2009)建议的Hausman内生性检验方法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与实践能力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借鉴刘建秋和朱益祥(2019)、庞敏(2015)的经验,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IC)与公司研发人员与职工人数的比例(ER)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CSM)与实践能力(CSP)的工具变量。这是因为,内部控制指数反映上市公司的内控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日益成为内部控制拓展的重要方面;研发人员与职工人数的比例是测度企业对科技创新投入端的重要指标,与产出端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技术能力正相关;而这两个变量与公司绩效的直接相关性并不显著,符合工具变量的理论选取条件。实证检验所需数据来自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

由表5可知,当被解释变量为TOB时,豪斯曼检验统计量分别为-4.778与0.050,P值均不显著,故接受“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当被解释变量为ROA时亦然。可见,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CSM)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CSP)均为外生变量。表明本文借鉴钱明等(2016)采用滞后一期方法对控制内生性具有一定成效。

综上,在解释ROA与TOB的模型中,当期与滞后一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

表 5 Hausman 内生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TOB			被解释变量:ROA		
解释变量	CHI2	P	解释变量	CHI2	P
CSM	-4.778	—	CSM	-5.320	—
CSP	0.050	0.973	CSP	0.020	0.989

注：“—”表示 P 值不存在。

财务绩效负相关,据权衡假说理论,企业实施有效的社会实践往往会耗用生产经营的大量资源,从而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管理能力并未对财务绩效产生正面影响。而当期与滞后一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的协同作用始终在 5% 及以上显著性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表明加强社会责任管理与责任实践及其协同作用是我国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有效捷径之一。即当企业内部管理水平较高,社会实践项目有序推进时,拥有较好资源的企业整体运行步入正轨,同时加大产品研发,开拓崭新的产品市场,呼吁利益相关者加大投资,引导消费者采购,公司绩效在短期内迅速上升。研发支出作为企业潜在的成本,在社会责任影响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中也产生了正向协同作用,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迅速占领经营市场,为企业争取竞争力,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双协同作用表明企业增加管理实践能力、加大研发支出会显著促进企业财务价值的提升,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培育新的盈利增长点。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选取 2014—2017 年沪深股市 300 上市公司及房地产、食品、制造业、建筑、运输、能源、服务业、公共事业、采矿业、农业、综合 11 个行业市值排名前 50 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实践能力及其协同作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公司大多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导致社会责任管理能力不足,在企业社会实践能力方面也处于较低水平。回归分析表明:当期与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管理能力与当期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但与当期市场绩效不相关;当期与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实践能力分别与当期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但均与当期市场绩效负相关;当期与滞后一期社会责任管理能力与实践能力对当期财务绩效与市场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协同作用。

(二)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当从以下方面优化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

首先,企业应当规范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并加强社会实践。在新时代下,企业应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驱动要素,积极推进社会责任管理,完善社会责任理论体系,以合理的方式进行企业评估,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日常考核当中,促成企业行为规范化,不断改进,形成专属于企业自身的管理体系,降低财务成本,减少财务周期滞后性的影响。同时,加强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社会声誉,增强自身软实力,实现社会价值,完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目标。

其次,重视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的协调统一。新时代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企业必须重视社会责任建设,结合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长短期的协同效应,创造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氛围,才能实现与社会的同步发展。企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应当结合实际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制定对应的管理实践目标,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从而推动企业与社会共同进步。

最后,应当完善社会责任监管体系。我国资本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信息处于弱反应状态,对企业实施责任实践的行为存在较为悲观的预期。因此,在“软约束”收效甚微时,“硬约束”应发挥作用,政府应加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科学指引,转型升级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高质量企业管理模式。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社会责任监管体系,导致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政府应加强约束和监督机制,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依靠社会各界进行监督,对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公示并惩罚,回应市场与社会的关切;同时,建立社会责任监督体制,推进社会责任法制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白仲林, 2008. 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 陈佳贵, 黄群慧, 彭华岗, 等, 2009.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3] 陈熙江, 2014. 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公司绩效的中介调节效应——基于中国 100 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的经验证据[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3): 101-109.
- [4] 崔也光, 李博, 2018.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R&D 投入与财务绩效——基于我国主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 60-69.
- [5] 邓曦东, 唐宁, 邓沛, 2019. 汽车行业上市公司高管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以股权集中度为调节变量[J]. 财会通讯(21): 79-82.
- [6] 冯丽艳, 肖翔, 程小可, 2016. 社会责任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效应——基于我国经济环境的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 19(6): 141-154.
- [7] 高尚, 陈宁, 李瑞峰, 2019. 中药企业公司治理、社会责任和公司绩效的研究[J]. 中国医药导报(11): 183-187.
- [8] 郝秀清, 全允桓, 胡成根, 2011.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企业社会表现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0): 110-116.
- [9] 贾建锋, 唐瑶瑛, 李俊鹏, 等, 2015. 高管胜任特征与战略导向的匹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 管理世界(2): 120-132.
- [10] 靳小翠, 2018. 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社会资本吗? ——基于市场竞争和法律制度的调节作用研究[J]. 中国软科学(2): 129-139.
- [11] 李倩, 邹国庆, 郭杰, 2019. 转型经济下的公司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制度环境与技术型高管的调节作用[J]. 山东社会科学(5): 143-148.
- [12] 李双辰, 张春旺, 李芳, 2015. 电力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基于 51 家公司 2011—2013 年面板数据[J]. 会计之友(24): 60-64.
- [13] 林毅夫, 潘士远, 刘明兴, 2006. 技术选择、制度与经济发展[J]. 经济学(季刊)(2): 66-85.
- [14] 刘建秋, 朱益祥, 2019. 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企业价值——基于社会责任的遮掩效应检验[J]. 华东经济管理, 33(10): 169-176.
- [15] 陆孝春, 2013. 中小企业社会责任认知、驱动因素与实践及其绩效研究[D]. 南京: 南京财经大学.
- [16] 骆嘉琪, 匡海波, 沈思祎, 2019. 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以交通运输行业为例[J]. 科研管理, 40(2): 199-208.
- [17] 马建威, 黄春, 2019.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J]. 科技促进发展(2): 113-120.
- [18] 庞敏, 2015.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技术创新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探讨[J]. 统计与决策(8): 177-179.
- [19] 戚依南, 张晓娣, 2008. 供应链管理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 中国管理科学, 16(S1): 492-497.
- [20] 钱明, 徐光华, 沈弋, 2016.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计稳健性与融资约束——基于产权异质性的视角[J]. 会计研究(5): 9-17.
- [21] 王立, 王龙伟, 2018. 绿色管理如何影响企业公司绩效? ——战略导向和技术不确定性的影响[J]. 研究与发展管理(6): 38-50.
- [22] 伍德里奇, 2009. 计量经济学导论: 现代观点(第 4 版)[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23] 肖红军, 王晓光, 李伟阳, 2016. 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4] 徐二明, 衣凤鹏, 2013. 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市场发展与政府所有权的调节作用[J]. 中国流通经济(11): 90-95.
- [25] 徐二明, 衣凤鹏, 2014. 中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关系——行业竞争的调节作用[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91-98.
- [26] 许慧珍, 林丹明, 2008. 战略群组、信息技术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J]. 科技管理研究(10): 110-112.
- [27] 许庆瑞, 谢章澍, 杨志蓉, 2006. 企业技术与制度创新协同的动态分析[J]. 科研管理, 27(4): 116-120.
- [28] 尹开国, 刘小芹, 陈华东, 2014. 基于内生性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中国软科学(6): 103-113.
- [29] 于洪彦, 黄晓治, 曹鑫, 2015.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中企业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J]. 管理评论, 27(1): 169.
- [30] 张爱卿, 师奕, 2018. 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绩效与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基于公司绩效调节作用的一项实验研究[J]. 经济管理(2): 72-88.
- [31] 张兆国, 靳小翠, 李庚秦, 2013.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交互跨期影响实证研究[J]. 会计研究(8): 32-39.
- [32] 周雪, 马舜羿, 2019. 企业社会责任、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J]. 技术经济, 38(11): 22-32.
- [33] 朱泽钢, 孔龙, 2014. 制度成本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111-117.
- [34] 朱乃平, 朱丽, 孔玉生, 2014. 技术创新投入、社会责任承担对财务绩效的协同影响研究[J]. 会计研究(2): 57-63.
- [35] BRAMMER S J, PAVELIN S, 2006.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social performance: The importance of fit[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3(3): 435-455.
- [36] MCWILLIAMS A, SIEGEL D, 2000.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Correlation or misspecification?[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5): 603-609.

- [37] MOSKOWITZ M, 1972. Choosing socially responsible stock[J].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1): 71-75.
- [38] O'RIORDAN L, FAIRBRASS J, 2008.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Models and theories in stakeholder dialogue[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83(4): 745-758.
- [39] RODRIGUEZ-FERNANDEZ M, 2016.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J]. Business Research Quarterly, 19(2): 137-151.
- [40] SURROCA J, JOSEP A, WADDOCK S, et al, 2010.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intangible resourc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1(5): 463-490.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Capability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Chen Xujiang¹, Liu Tingting²

(Accounting College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ampl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11 industries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 from 2014 to 2017,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on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ability, practical ability and their synergy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market performance) is made. Through the fixed effect mode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has a lag effect, but it is not related to market performanc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 a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the current period an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in lag period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 ability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market performanc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ability have a long-term synergistic effect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market performance. The conclusion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listed companies to promot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Keywords: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abil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 ability; coordination; company performance